

何满子 著

汲古 说林

重庆出版社



汲古
说林



重庆出版社

汲古说林

何满子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卢季野

封面设计：剑 歌

何 满 子 著
汲 古 说 林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2.125 插页2 字数192千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50

*

ISBN 7-5366-0225-1

I · 36

书号：10114·341 定价：2.80元

目 录

代序.....杨 公 骥 (1)

章回小说和叙事文学的民族风格..... (19)

中国短篇小说源流发微..... (25)

古代小说研究肆言

 本该作为后记的前记..... (33)

 研究古代小说与文学实践..... (34)

 “为市井细民写心”说质疑..... (36)

 “主题”问题献疑..... (39)

 谈国外研究倾向..... (41)

 最现代小说型的古代小说..... (43)

古代小说常谈

 世界最早的散文体小说出现于中

 国..... (47)

 白话短篇小说辨源..... (49)

 小说和戏剧的亲密血统..... (52)

 长篇小说的路子..... (54)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小引..... (57)

明清小说研究途径的随想…………… (62)

对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估价…………… (69)

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

——《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片论…………… (76)

《三国演义》的蜀汉正统观及其他…………… (84)

施耐庵之谜…………… (94)

从宋元说话家数探索《水浒》繁简本渊源

及其作者问题…………… (102)

神魔小说《西游记》概说…………… (126)

《蒲松龄与民间文学》小引…………… (155)

文学的觉醒

——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三十周年…………… (159)

在评价《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以前…………… (165)

略谈《儒林外史》

——为《中国古代小说阅读提示》而作…………… (171)

说文学遗产的借鉴

——为胡邦炜、沈伯峻《〈镜花缘〉研究》

所作的序…………… (184)

毛宗岗评改本《三国志演义》前言…………… (189)

读《红楼梦》断想…………… (202)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随想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即兴发言的追

录…………… (214)

文学史不能搞集体编写·····	(227)
与友人论文学史短简·····	(233)
古代诗歌赏析四题·····	(237)
· 柳惲《江南曲》·····	(237)
范仲淹《渔家傲》·····	(240)
孟浩然五律《与诸子登岷山》·····	(244)
李白《菩萨蛮》·····	(247)
《聊斋志异》论析二篇·····	(253)
古人笔下的荷花·····	(265)
鉴真和尚与日本律宗的建立·····	(270)
元祐蜀洛党争和苏轼的反道学斗争·····	(291)
苏轼与画·····	(328)
金圣叹的生平、人生态度与文学观·····	(333)
后记·····	(373)

代 序

杨 公 骥

按：这是杨公骥教授一九八二年五月因评拙著《论儒林外史》而写给我的一封信，原信长逾万言。其中有不少对拙作的夸奖之词，我已删去了不少段落；但为了行文的连贯和某些虽是溢美的奖饰却牵涉到治学论文的主张，所以删涂不尽。此信虽为《儒林外史》而发，但议论的范围远远越过本题而涉及治学路数、学术思潮和意识斗争间的复杂表现、精神现象与社会关系的响应、中西思想发展的比较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刻见解，并用简括而精当的语言表述了其古代文化的融会贯通的卓识。在前，除了对过度的夸奖深感愧赧外，得益处，实有听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因此不敢自秘，并甘冒借他人之口以自炫之嫌，将此函的节文作这个集的代序，敬

希读者亮鉴。一九八五年十月，何满子记。

月前曾收到兄之大作《论儒林外史》。本多年之老习惯，先信手翻阅一下，不觉为之吸引了，不可释手，一口气读毕。之后深为所动。由此书中，不仅可看出兄之学识、见解，而且可窥见兄之思想、情感、性格、风趣。为文，若能由证中陈理，于理中见性，于性中抒情，则属论文之上乘也。而此文竟是二十八年前的青年时之作，不禁为之浩叹！

本想写点读后感就正于兄，但事冗时促，无暇动笔，拖拉至今。迟迟未作复书，即固此。今日且按兄书之章节，漫谈感想如下，信手拉杂而书，不当“意见”，谈心而已。

兄批判胡适之各节，甚是，也甚好。胡适在“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中，其开辟之功，固不可泯，然其人甚浅，对文学艺术乃是外行。其治学是从其实用主义“内心之格局”（杜威：孔森用语）出发，故不能不为其“内心”之浅见俗识所囿。

胡适学了点西方“形式主义的文学进化观，”但学之不深，眼光甚浅，所以只能就“文体”“语体”的“形式”来发议论、作文章。他之所以推崇《水浒》、《红楼》、《儒林》，皆因其使用“白

“白话文”，可为其“白话主张”张目故也。对这些名著各自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甚至其手法“形式”，语言“形式”，他都限于认识水平而无能认识，不在其思维范围之中。他的“形式主义”主张只达到“反古文，倡白话”的水平，凡是“白话”就好，所以他对《儿女英雄传》（一口京片子）、《品花宝鑑》、《海上花列传》（苏白）也是推崇备至。

胡适学了点西方的“行为主义”和“表现主义”哲学，但识之甚浅。故胡适自己的“行为主义”达不到“心理分析”水平，只能在“生平行状”上作探求；其“表现主义”则达不到从作者“自我意识”着眼，只能从作者的“遭遇得失”着眼。他把文学作品，都看成是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我写照。他认为“文穷而后工。”作品都是作者倒楣后怀旧伤今的情感之产物：破落户子弟曹雪芹写《红楼》，“嫖光了家产”的吴敬梓写《儒林外史》——皆是“表现”自我潦倒。对此，兄驳之甚有力。

胡适还学了点西方的“考证学”（此学说后与佛洛伊特潜意识学说混合成为“性心理实证主义。”如不为贤者讳，则闻一多先生与郭老都多少曾用此法考证《诗经》中的诗，当时西方学者纷纷热衷于考证莎士比亚有无其人？是否培根的化名；

莫里哀是否与其私生之亲女结婚？如不是的话，该女究竟是那个男子的私生女；王尔德究竟鸡奸过多少“美男”？拜伦是如何得的“梅毒”？迭更斯与其小姨子是否有点“勾当”？……等等，钩隐发微，题目之多，不可枚举。胡适因此养成“考据癖”，效洋人之洋法，论中国之学术，于是集全部之精力考证起曹雪芹、吴敬梓等的家世、生平、际遇、癖好、轶事来（考据不是不需要，但有限度）。这算不得“文学研究”，乃是离题走板，节外生枝。且举一喻，据说牛顿看苹果落到地下，受启发而发现万有引力，瓦特看到茶壶盖被蒸气冲起受启发而设想出蒸气机，但是如果有哪位物理学家不研究、解说牛顿的引力原理和瓦特的机械构造，却孜孜于“考证”牛顿所见到那棵苹果树是何种属，是谁种植的；瓦特所用的那具茶壶是铜制还是铁制，是在哪个商店化多少便士买的。那么，人们对这样的物理学家将看成是“疯汉”，对这样的“研究论文”将视为笑谈。然而，胡适及其门徒却与此相似，他们不去研究解说《红楼》、《儒林》中的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不去研究人物形象，不去研究表现方法和语言风格，却孜孜于“考证”作者的轶闻琐事。当然，对有关古代作家的轶闻琐事，从事文学史或文学理论的研究工作者，也都要广泛搜集，精心考证，不过，这只

是为了全面地占有第一手材料，以便对古代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素材作全面认识从而得出正确判断，绝不可用“考证”取代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研究。否则，必然趋入“旁门邪道。”其可笑与研究考证牛顿的苹果或瓦特的茶壶同。

胡适之学虽浅，然影响甚大，也甚久，直至今日，“红学”界中的有些学者，虽号称“马家”，而实私淑“胡家”，只是考证得越发精微，已由考证“大观园究竟在何处”、“秦可卿的死因”、“贾宝玉为何不吃稀饭”等粗问题，进入更深入地考证起“曹雪芹是否擅长糊风筝，是否精于烹饪”、“贾府马棚如何失火”、“宝玉是否讨饭、入狱”等“尖端”问题了。

弟读兄大作后，感到兄与此种文风迥不同，而是将《儒林外史》作为文学作品处理，这就不不同于“胡家旧门风”；作为艺术品剖析，这不同于“解放新八股”。

其次，弟认为兄之文风甚佳。如弟无误，则兄是由对作品形象的分析中得出理性观念，由于这些理性观念是以事为据，非由外加，故其论辩足以服人；同时在这理性观念的表述中抒发自己情感，由于这感情是以理为基，非浮浅的偶感，故其叙述足以动人。书中，时见激情，此非论文“正统”，较近别林斯基的风格。然亦由此，书中

不仅有对吴敬梓、“儒林”诸君子的形象分析，而且也有兄自己的“形象”在。由此看来，兄选《儒林外史》为论题，并非偶然。由于在对待名利和世俗纷争上与吴敬梓的心志有同感，故兄方能对其书擘肌析理剖解入微，言之淋漓，骂之痛快。胡适及其传人万万作不到这点，因彼等不幸生之也晚，否则也都是可以入吴敬梓的“儒林谱”的。

信手涂抹，扯远了。以下分条言之。

①胡适认为《儒林外史》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反对“八股文”。这倒也不是他故意如此，而是由于他心目中可怜见只有一具尺子，只能丈量“白话”与“文言”，“古文”与“八股”之分。对此，兄驳之甚有力。不过，弟认为兄对顾炎武的评价似乎偏高。固然，顾炎武反对“科举制”，但隋唐之后，反科举取士者，代不乏人，非亭林创见。而黄梨洲、顾炎武之所以反对科举取士，是因为科举之法困贤才，而资侥幸，因此主张恢复《周法》之“乡举里选”。在主张“乡举里选”上，他们与程、朱之意同，不同之处是程、朱重“德行”，黄、顾重“贤能”而已。所以顾亭林提出“请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员之制，天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使“士人”“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

猷共治”（即“当官”）。固然，顾炎武也反对“八股文”，但明清时代，反对“以八股文取士者”，也是代不乏人，非顾氏独见。而顾氏之所以反对“八股文”这一文体，是因为此“文体”不切“实用”，无益“经术”。其主张是：“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即传经）也，纪政事（纪史）也，察民隐（为诗）也，乐道人之善（为文）也”，“故凡文之不在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这分明是封建儒家的“正统”思想，乃“老生之常谈”，并无“新”意。因此弟认为顾亭林虽是儒家之佼佼者，但其思想体系并未能超越封建文化思想的老范畴。

其次，当时，“理学”（道学）虽与“实用之学”（时务）相对立，但并非本质对立，往往是互相表里。主“性理”者与主“实用”者，同样都主张“尊经明圣”，“以六经为指归”，“文以载道”，“学以致用”；所不同的，“性理”派重在以儒术修身，“实用”派重在以儒术治国。孟子不云乎：“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故儒生“穷则独善其身”，可为“明心见性”的道学先生；“达则兼善天下”，可为“经世致用”的才宦能吏。故此两派，其道不相违，然皆合经旨。因此，与顾亭林并称的北方大儒颜习斋，既大讲“性理”，又讲授礼、

乐、书、数、天文、地理、武备、兵法、战法、射、御、技击、经、史、诰制、章奏、诗文、水学、火学、工学、医学、象数(卜筮)、理学(程朱陆王之学)、律历等“实用文学”(这是他自己为漳南书院立的各科专业),集大成矣!

颜元,乃弟乡前辈。其学影响甚大,横得高名,至今还在受捧。然其人实乃一农村腐儒,迂阔可笑。其大志是承继“道统”立个“教门”,故时时以“教主”自命,闺门之内,也以古礼自律。平日,每一言皆寓微言大义,欲为天下法;每一行皆有“讲究”,欲为天下式,很像个“老红卫兵”。而且信命,信兆,信鬼神。他自言自己生时不凡,“母孕十有四月而生,乡人望其宅有气如麟,忽如凤,遂降生,啼声甚高,七日能翻身。……手纹生字,舌有文曰中,足蝉翼纹甚密……”。(李塉作年谱)他写过一篇《寻文神应记》,记述他赴东北寻文时,沿途曾得到“东岳帝君”、“城隍神”、“关圣帝君”的再三再四的指示,其文的亡魂也不断“显灵”,甚至显形。能娓娓而谈“白日见神见鬼”之情状,诚奇文也。(见《习斋记馀》卷二)。

如兄所论,吴敬梓反对用任何“敲门砖”牟取“功名利禄”。因为理学也罢,“制义”也罢,“古学”(汉学)也罢,“致用之学”也罢,其作为“敲门砖”一也。从《儒林外史》中,还看不出吴敬

梓赞称那块“砖头”或贬斥那块“砖头”。固然，书中表明他是攻击了“八股制义”的，但那是因为这是朝廷的制度和士人的名利阶梯而加以攻击，并不是因为这文体“无济世用”而加以攻击。所以，作品中虽然对周进、范进除“时文”外一无所有的可怜相，作了嘲讽、调侃，但当这两老爷“学而优则仕”之后，作者便未对其不谙“吏道”、不通“时务”、“无济于世”加以责谴。可见，吴敬梓所攻击的是整个封建国家制度和封建人生观，并非单独攻击“八股取士制”。在这一点上，吴敬梓与顾炎武、黄梨洲是大不同的。因此，似不宜强调顾、黄等的“先进思想”对吴敬梓有何大影响。

②如兄所言，清初到乾嘉时的“考据学派”兴起，是“对于宋明理学的反动”。其兴起之契机和历史之意义甚深刻。

汉之后，儒家教义起着封建宗教的作用（就是缺一个“神”），所谓十三经起着《圣经》或《可兰经》的作用：《易经》似《启示录》、《书》、《春秋》、《左传》似《创世纪》、《列王纪》、《论语》（四书）似“福音书”，《诗经》似《诗篇》、《雅歌》、儒家诸子似《使徒行传》或“保罗书”，“三礼”则似《可兰经》的起居行为规定。——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基础，必然也有着同性质的近似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思

想)。

如作为意识形态从其观念实质看来，则所谓“宋理学”(道学)，很近似欧洲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的“经院学说”。它们都是宣传“禁欲的”、“修真养性的”、“反省忏悔的”、“伦理道德的”等劝人为善的繁琐的“学说”。《性理大全》、《近思录》、“×子语录”都是近似“布教书”一类的著作。程、朱在明清时代，被尊为“夫子”(“圣徒”也)，配“十哲”，入孔庙，列祀典。其“注”或学说，被朝廷钦定为标准“教义”。凡科举的试题、制义或讲学、立论，都必须“遵依朱注”如有著书或议论“不宗程朱”者，皆以“肆诋程朱，惑世盗名”、“评驳朱注，狂妄诡僻”、“违背朱注，自逞臆见”论罪。此“钦案”非一，且举乾隆六年九月丁亥“上谕”为例：“谕军机大学士等……，我圣祖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而谢济世辈，倡为异说，互相标榜，恐无知之人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风之义，且足为人心学术之害。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关系，亦不可置之不问也。尔等可传谕湖广总督……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有显与程朱违背抵牾之处……查明具奏”。可见，宋道学已成为“国家教义”，反对者甚至不同意者，已被作为“异教徒”入罪。

但所谓宋儒，其学乃是凭借《四书》中的性、心、知、德、情、仁、义等字样，暗中属以禅学，再发挥引申。他们大多“不识字”，以字的今义解释古义。因此，清初兴起的所谓“朴学”，首先是从文字的训诂开端，考证“经”文的古音、古义，如顾炎武自言：这是为了“明六经之音，复三代之旧”。这名义甚堂皇，不可加罪。然而，如果用古字音以定古字义，用古字义以定经旨，用经旨以断“夫子之心”，这就使得程朱的“性理之学”失去凭倚，变成“诬及圣人”的一派胡言。可见这一着是很厉害的。所谓“明道在于读经，读经始于识字，字皆不识，讲甚学？明甚道？”——是朴学大师的名言。进而，由训古文字扩延到探讨“经义”、“考证”六籍。为了撼动唐宋之后居于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学”。于是援引汉儒“今文”经说，“公羊派”学说从而盛行。但这是有选择的，只是为了借汉儒之口驳宋儒之妄断，并非为了复活“公羊学”。因此公羊学的最主要观点，如“五行五德”、“天人感应”、“灾异”、“符命”、“讖纬”等，乾嘉诸老对之并无兴趣。“考证学”逐渐“深化”，便考出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成为其“变法”的理论依据之一。

由此看来，所谓“为考据而考据”，乃是个“虚假概念”，和“为艺术而艺术”或“为恋爱而恋爱”